

实业诗人第一家

——郑观应诗歌研究 (上)

〔澳门〕 邓景滨

一、郑观应诗歌研究的现状

“世居澳门”^[1]的郑观应,被当代学者誉为“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”,“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”^[2];同时,也是一位脚踏实地提倡“富强救国”的实业经营家、广施博济的慈善家、忧国忧民的爱国者。

郑方泽,本名官应,字正翔,号陶斋,又号居易、杞忧生、慕雍山人,别号待鹤山人,或号罗浮待鹤山人。1842年7月24日生于香山雍陌,1921年6月14日卒于上海,享年80岁。主要著作有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及《盛世危言》等。

本世纪80年代之前,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尚停留在上述的政治、思想、经济诸方面。80年代之后,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领域,并对他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。例如——

郑方泽的《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》首次提到郑观应“在散文改革的实践上,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散文家”,赞扬他的散文具有“清新的笔调,简朴的语言”,并指出他“那种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,生动、自由的文言文体,也推动了这一时期散文的改革”^[3]。

管林、钟贤培主编的两卷本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》在“散文创作的发展和演变”一章里,称赞郑观应的政论文“笔调清新,语言简朴,以诚恳坦荡的感情,陈述救国救民和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,有一定的感染力”;并指出郑观应与王韬、冯桂芬等人“用通俗古文写作的近代报刊政论文体,比起龚自珍、魏源的散文,向前跨进了一步”^[4]。

郭延礼的三卷本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》称赞郑观应和王韬都是“近代第一批报章政论作家”,将他结集在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和《盛世危言》中的文章赞许为“当时政论文的代表作”,“语言简练质朴,有较强的感染力,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这部政论文集的热情读者”;他用“通俗晓畅的古文写作近代报章政论,对于桐城派古文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”。“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,王韬和郑观应等人的报章政论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”^[5]。

马良春、李福田总主编的八卷本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正式给郑观应冠以“近代散文家”的桂冠,并赞誉他是“近代早期卓有成绩的散文家。他宣传维新主张的散文著作和随笔札记,突破了桐城古文“义法”、“雅洁”的约束,从实际出发,说理详明,语言通俗简朴,情感恳切,文笔清新。”^[6]

郑观应在散文领域中的成就和地位,终于得到人们的肯定赞扬,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。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。

然而,直至今天为止,人们似乎仍然忽视了对郑观应另一个重要文学领域——诗歌创作——的研究。目前,除个别的散篇文章偶尔提到郑观应某些零星的诗歌作品外,并未有任何一篇稍为全面地或较为系统地论及他的诗作的论文,更遑论在近代诗坛上给予他应有的地位。请看——

钱仲联编著的《近代诗钞》收录近代诗人 100家;

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》概论卷的附录一:《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作者字号笔名录》共收当时诗人 900余家;

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《近代诗选》有 50家;

陈衍的《近代诗钞》录咸丰以来诗人 307家;

严伟、沈逢甘、万钧等人所编选的《近代诗选》,选道咸以来诗人 509家;

孙雄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》,录道光以来四朝诗人 2000余家;

徐世昌辑《晚晴诗汇》,收清代诗人 6100余家;

……

以上近百年来所编纂的各种近代诗选,均未为郑观应的诗作留一席位。直至1993年4月出版的《岭南文学史》(陈永正主编),才在书中“同治、光绪间的诗文”一章提到:“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,所著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中,有不少写时事、经济内容的诗歌”,“这类的诗多发议论,质朴无文,有文献价值而缺乏艺术价值。”^[7]这几句简单议论,还未能对郑诗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。

诚然,郑观应绝对无心作诗人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幼而失学,何敢言诗。”^[8]“自愧不能文,何敢耽吟咏。”^[9]然而,他“随手写录”,“或五言或七言”的诗篇,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已有368题726首,比近代诗坛开山祖龚自珍的605首还要多。郑观应的诗,分别见于:

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278题466首;《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》35题145首;《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》48题106首;

散见于其他著作而上述3本诗集未收的诗共7题9首。其中一首极为珍贵的五言长古未刊诗《王子暮春志感》,见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《近代名人手札精选》。

此外,尚有几本诗集,笔者只见书目而未见内容,计有:

《待鹤山人六秩唱和诗》上下卷;《待鹤山人七秩唱和集》;《待鹤山房唱和集》;《蜀船唱集》。

以上四本诗集,肯定已有部分或大部分诗作分别收入前述的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《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》和《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》之中。但因未睹这五本诗集的全貌,故未能肯定尚有多少佚诗。据郑观应《南游日记》所载,中法战争期间,他曾奉命往南洋刺探军情,在香港往西贡轮船上,曾赠日本造纸商人大川平三郎诗二首,惜至今未见其诗。但无论如何,郑观应现存的726首诗,已是十分可观的数量,是一个尚待开发的诗歌矿藏。

二、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

近代诗坛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:一是上承清初宋诗派的宋诗运动(代表人物有程恩泽、何绍基、郑珍、金和、莫友芝等人)及延至清末的同光体(代表人物有陈衍、陈三立、沈曾植、郑孝胥等人);一是开近代新诗风的尊情派(代表人物有龚自珍、魏源、张维屏、张际亮、林昌彝、贝青乔等人),诗界革命中的新派诗(代表人物梁启超、康有为、黄遵宪等人),新学诗(代表人物有谭嗣同、夏曾佑、蒋观云等人)以及南社诗派(代表人物有柳亚子、高旭、苏曼殊、黄节、秋瑾、潘飞声等人)。两大流派各有不同的诗歌主张,从整体来说,后一流派代表了近代诗歌的发展方向。

郑观应无心作诗人,更无心作诗论,故没有留下甚么诗歌专论;但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诗集中的两篇《自序》、诗作中有关的小序和诗句去追寻、探讨他的诗歌创作观,并从中清晰地看到他的诗歌主张是属于新派诗范畴。

(一)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,郑观应主张“直记时事”,“寓意规谏”。他在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己酉本《自序》中写道:

余本不能文,何敢言诗。惟于国家之事伤心惨目,有闻自外人论我国利弊关系大局,往往梦寐不安,为之行愁坐叹……故自忘鄙俚,复随手写录,几不成为韵语,或五言、或七言,寓意规谏,大声疾呼,以期上下一心,重见唐虞盛世。所谓以文字为诗,以议论为诗,直记时事,不避嫌怨……

首先,郑观应在这段序言中,鲜明地强调了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。他坦诚地表示:他写诗并非吟风弄月,更非无病呻吟,而是为了“关系大局”的“我国利弊”,为了“伤心惨目”的“国家之事”;正是这些关系到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的大事令他“梦寐不安”、“行愁坐叹”。基于这种深沉炽热的忧国之情,使他以“韵语”的形式,“随手写录”,“或五言、或七言”,或记事、或伤时、或感慨、或议论,甚至“不避嫌怨”,秉笔直书。

这种诗歌主张,直接指导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实践。郑观应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当年。此后8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,诸如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日战争、维新变法、义和团、八国联军入侵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、反袁运动、铁路风潮等等,均反映在他的诗作之中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:郑观应的诗歌,是一部“近代中国风云录”!

其次,郑观应在他的自序中,还强调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。郑观应和同时代的进步诗人一样,都希望能将诗歌作为唤醒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。本来,郑观应已向朝廷献上了《盛世危言》,但初时未获回应,故感到有些失望;但又不忍国事日衰,于是,不揣鄙俚,愤而为诗,希望以另一种形式向国民吹响救国的号角。这在他的己酉本《自序》中已明白地披露了此种心声:“……虽已上书当道(按:指向朝廷献《盛世危言》),而人微言轻,置若罔闻,未由展布,故自忘鄙俚,复随手写录,几不成韵语,或五言、或七言、寓意规谏,大声疾呼,以期上下一心,重见唐虞盛世。”在这个意义上,郑观应的诗歌可以说是他的韵文版本的《盛世危言》它与散文版本的《盛世危言》一样,其目的都是希望以“危言”救世!

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,且要为社会服务,郑观应的这种诗歌主张,与汉代王充的“为世用”,与唐代白居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与清初黄宗义、顾炎武等人的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以及近代文学始祖龚自珍的“经世致用”,新派诗倡导者黄遵宪的“以言志为体”等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。这对于当时风行一时的宋诗派所提出的以学问、考据为诗,“诗”与“学”结合的主张,无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异响!

(二)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,郑观应主张“吟咏性情”、“畅叙襟期”。他在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己酉本《自序》中提出:“诗者,吟咏性情也。”又在戊戌本《自序》中表示:“心有所感,信笔赋之。……若逢佳士,畅叙襟期。频频驿使,传达遐思。一腔热血,三寸毛锥,聊抒闻见,贤于奕棋。”

郑观应是性情中人。他的“咏情”说与龚自珍的“尊情”说,以及黄遵宪的“以感人为用”都是一脉相通。他的诗歌洋溢着强烈的感情:即有忧国忧世的爱国之情,也有慈善为怀的恤民之情,还有语重心长的亲友之情。

郑观应的忧国爱民之情,是贯穿他的诗作的大动脉。在诗中,他面对内忧外患,感时伤世,疾呼改革,果真是“一腔热血,三寸毛锥”!

他在组诗《庚申、己未两岁秋感》的诗序中写道:“庚申、己未两岁秋感,不足云诗,其中论时事者,愿同胞悉吾国积弱之原,知耻爱国,合谋公益,而亟求自强……”其赤子之情,在诗中俯拾可见:

“莽莽乾坤劫运开,悲歌斫地有余哀。”(《时事感怀》)

“势如一线悬危卵”(同上)

“幕燕何知大厦危”(《庚申、己未两岁秋感》)

“狂澜欲倒待谁挽”(《题吴剑华准今论》)

“鹰瞵虎视环邻邦,“割地偿费势日蹙”(《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》)

“危急存亡秋,变法宜决断。”“吾侪抱杞忧,闻鸡以待旦。”(《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》)

“外侮既频仍,内战又潜伏。”“救时宜发愤,变法尤宜速。”(《书愤》)

“此时沧海正横流,蚕食何堪竟效尤。莫再因循须奋愤,维新国事共绸缪。”(《上孙燮臣师相、邓小赤师帅论时事》)

“会看四亿黄人种,奋起边庭树伟勋。”(《时事感怀》)

“愿扫浮云日再明,五州同享承平福。”(《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》)

郑观应的爱国忧民之情,不仅洋溢在他的大部分诗篇之中,而且集中凝聚在他的一个笔名上。“杞忧生”,这个笔名最早见于《易言》的“自序”,时为光绪元年,即公元1875年。当时郑观应34岁。其意取自“杞人有泪忧天坠”(《无题》),此“天”是指当时危机四伏的国家民族。他在诗句中多次阐明“杞忧”之意:“吾侪抱杞忧,闻鸡以待旦”,(《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》),“吾侪深抱杞人忧”(《亚细亚协会歌》),“仰天独抱杞人忧”(《与日本驻沪小田切领事论时事作歌并序》),“抚时徒抱杞人忧,托迹天南愿未酬”(《次彭宫保师南海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》)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郑观应的忧国忧民之情,时人王韬对郑观应《易言》的高度评价,其实完全可以移作诗评:“杞忧生

盱衡时事、思挽时局、幽愁积愤之所为作也^[10]，“盖救时之药石也”^[11]！吴广沛也说“公之诗出以血性忠义”^[12]，胡昌俞亦云“陶齐诗卷帙不及太白之丰，而情殷匡济”^[13]！

郑观应在诗中除了直抒爱国忧民之情，也有不少篇什流露出对妻妾或子侄之亲情。如悼念赵氏的《悼亡》五首，以及《训子》八首、《余涉历世事备受艰虞聊赋长歌以诫儿辈》《箴言寄纪常侄》、《训子侄之肄业日本者》等，都流露出郑观应的真性情。

(三) 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，郑观应主张“不拘格调”，“不取法古人”。在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己酉本《自序》篇末，郑观应写道：“……不拘格调，既不取法古人，又无入神之句，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，但救国苦心妇孺皆知，一览即印入脑际，或于数十年后无人不忆及当时形势……”

郑观应认为，诗歌须“直记时事”、“吟咏性情”，而不必拘谨于古人古法，故在他的诗歌创作中，多是“心有所感，信笔赋之”，形式多样，不拘一格。这与新派诗人打破形式束缚的主张正相吻合。

综览郑观应的诗作，既有五言、七言，也有杂言及骚体句式；既有绝句、律诗、排律，也有古风、民歌体；既有押平声韵，也有押仄声韵或平仄通押；既有一韵到底，也有转韵或叠韵；既有四句的短诗，又有 214 句的长篇古风，还有多达 43 首的组诗……

郑观应十分重视民间文学，并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养料，使他的不少诗歌洋溢着民歌风味和乡土气息。光绪四年（1878 年），郑观应 36 岁，在上海创办了筹赈公所，搜集了大量的慈善民歌广为印发，以启善心。这些民歌包括《劝募晋省十可省歌》、《铁泪图歌》、《广譬如歌》等。这些民歌对郑观应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良好的影响，例如：内容密切反映现实，形式通俗浅白易懂等。

(四) 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，郑观应主张“力扫靡词”，“文字尤贵显浅”。他在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戊戌本《自序》中直言：“不计工拙，力扫靡词。”又在己酉本《自序》中写道：“文字尤贵显浅，是直可为拙诗藏拙也。尚冀吟坛诸君勿谓入口无味以其覆瓿，则余之幸也夫！”

郑观应虽谦称自己的诗作“随手写录”、“鄙俚”而“入口无味”；其实，这正是其诗句不假雕琢、自然质朴的优点。洋务派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怀曾序其诗集说：“陶齐诗不立崖岸，不尚修饰，随事隶词，称情而言。”^[14]时人胡昌俞赞誉郑诗“温醇朴实，如其为人，一句一篇，率空依傍”^[15]。郑沅也说“其诗无所矫饰”，“不为艰苦刻缛之态，使读之者怡然不能自己”^[16]。

郑观应强调诗歌语言要“力扫靡词”，“尤贵显浅”，其目的在于让他的救国苦心和救国主张“妇孺皆知”，以便唤醒国人，奋起救世。此正如罗应旒所说：“救世诗宜浅，相期雅俗知。”^[17]

时人吴广沛在郑诗序中认为：“公之诗出以血性忠义”，“故不可改削转没其真，亦不可文饰反失其朴也”^[18]！此语正说明郑诗极具忧国忧民之真性情，故不可改削；而用语则朴实纯真，故不可文饰。

试以郑观应诗作为例，其用语通俗显浅，朴实自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。

一是化用俗语俗谚入诗。例如：“有志事竟成，苦心天不负。”（《自警》）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财为天。”（《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》）“欲无后累须为善，各有前因勿羡人。烦恼皆由多妄想，不能容忍不安贫。”（《训子》）“富由勤俭积，花酒勿流连。”（《训子侄之肄业日本者》）

二是化用前人成句入诗。例如，在《次彭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》中将杜甫名句“恶竹应须斩万竿”点化为“恶竹还须斩万竿”，在《治乱歌》中将曹松的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点化为“一将功成万家怨”，在《题梁佩琼女士飞素阁诗集》中将王昌龄的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点化为“想见冰心映玉壶”，在《羊城感事赠李直绳观察》中将李商隐的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点化为“雏凤贤于老凤声”，在《保主权》中将陆游的“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”点化为“堂堂中国岂无人”……

三是擅以民歌体入诗。郑观应曾在赈灾期间收集和印行大量的劝募民歌，对歌谣体通俗易懂、深入人心有深刻的印象，故在其诗歌中有不少类似民歌、竹枝词之类的作品。例如反映巴山风物的《巴峡》：“巴山如削势嵯峨，峡口滩头怪石多。水起盘涡成骇浪，舟人摇橹唱哈呵。”颇有民歌风味。又如《和吴瀚涛大令蜀江杂吟原韵》酷似竹枝词，充满乡土气息：“两岸高低尽石田，茶亭酒市傍江边。老夫稚子滩头坐，待唤牵舟得几钱。”

四是摭采新词新语入诗。近代诗坛中属于“诗界革命”的诗人，多有摭采新名词入诗者，郑观应亦不例外。除了一般的政治名词外，在郑诗中更有其他诗作中不易见到的大批经济新名词，真可谓琳琅满目，蔚为大观，足见郑观应见识之博，吸纳之广。例如：《莫若篇》“至于炼钢铁，制造枪炮船”中的“炼钢铁”、“枪炮船”，《感赋七律八章藉纪身世》“漫侈飞机潜水艇”中的“飞机”、“潜水艇”，《轻气球》中的“轻（氢）气球”，《杂感》“地球无吸力，安能转日月”中的“地球”、“吸力”，《劝农歌》“复设赛珍会，奖励较妍丑”中的“赛珍会”近似现在的“展览会”，《恭挽醇贤亲王》“献以德律风，电线从此作”中的“德律风”（即“电话”）和“电线”，《商务叹》“轮船电报开平矿”中的“轮船”、“电报”，《广州商务总会告成拟设工艺院纪事》中的“商会”、“工艺院”……此外，还有政治新名词的“变法”、“维新”、“立宪”、“宪法”、“共和”、“议院”、“下议院”、“民主”等等，在郑诗中比比皆是。

盛宣怀在己酉本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的序文中，将郑观应与新派诗人黄遵宪、潘飞声并称为“诗界中新巨子”，赞誉甚高：

“粤峤多畸人逸士，其以诗自鸣者，自屈、梁、陈三家而后，风雅递嬗，代不乏人。海通以来，迄乎近世，其能负专对之才，有干世之略，而仍不废嘯咏，名章后篇，照耀坛坫，号为诗界中新巨子者，吾于嘉应得黄公度廉使、番禺得潘兰史征君、香山得郑陶齐兵备。”^[19]

此三巨子中，以黄遵宪诗名最盛。他曾高瞻远瞩地提出“我手写我口”的诗歌主张；但他的《人境庐诗草》仍有不少追求用典、用语生僻的作品，并未能完全实践这一主张。真正能够实践这一诗歌主张的，却是“力扫靡词”、“文字尤贵显浅”的郑观应！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，郑观应确乎又比黄遵宪迈进一大步！